

白话
商君书
韩非子



B226
1

古典名著今译读本
白话商君书 韩非子



岳麓书社

责任编辑 刘皓宇
封面设计 许康铭

白话商君书·韩非子

张 觉 李传书 译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河西新民路)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湘潭望城县印刷厂印装

1994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997年3月第4次印刷

字数:330,000 印张:12.5 印数:22,501—27,500

ISBN7-80520-444-6/I·259

定价:(精)13.50元(平)10.00元

湘新登字 007 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厂址:望城县高塘岭镇湘江东路 251 号 邮编:410200

译者的话

本书与岳麓书社《古典名著普及文库》中的《商君书·韩非子》配套，所据原文即该社于1990年5月出版的张觉点校本。对于原文的误字误句，当时我已酌情附录了有关校记，现对此不再赘录。至于当时未及之处，则在译文中酌情注明。

译文以直译为主，以便读者能从译文中推知原文的字义。但为了使译文流畅，并使读者从译文中更深广地理解原文的内涵，所以也辅以意译，适当加入一些字句。所加入的字句一律不用符号标明，读者欲知其情，与原文一对照便可了然。

本书翻译时参考了俞樾的《诸子平议》、孙诒让的《札迻》、陶鸿庆《读诸子札记》、于鬯《香草续校书》、简书《商君书笺正》、朱师辙《高君书解诂定本》、杨树达《积微居读书记》、蒋礼鸿《商君书锥指》、章诗同《商君书》、高亨《商君书注译》、北京电子管厂等《商君书评注》、山东大学《商子译注》。对诸家之说，均斟酌再三，力求择善而从。但《商君书》不但行文古奥，而且讹误甚多，疑难之处比比皆是，所以前人未能正确理解的地方还有不少。对于这些地方，不得不以己意为之。因此，本书译文，与前人的理解不尽相同。但这些地方也并非随心所欲之为，只是限于本书体例，所以才未能将我立说的根据详加罗列罢了。在此谨望读者谅解。至于书中不当、谬误之处，尚望海内外方家指正。

张 觉

1992年1月13日

前言

韩非是先秦法家人物的杰出代表，他总结先秦诸子的思想成果，特别是集早期法家之大成，提出了一系列适应当时时势的政治理论。这套理论主要继承和改造了商鞅的法治学说、申不害的术治学说和慎到的势治学说，形成了新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这套思想，实际上就是一种君主专制主义的独裁理论。因而长期被封建统治者所采用。但是他的这套理论主张推行暴力政策，而且毫不掩饰，和儒家的仁政德治理论比较起来，实在是不容易被人们接受。所以，历代的统治者只好暗地里运用它，这样也就造成了几千年来我国大多数封建统治者实行“阳儒暗法”的局面。

在政治上，韩非主张严刑峻法。所谓法，就是国家公布的、形成了文字、编著于图籍的法规条令，法是人们的行动规范，必须强迫人们遵守。韩非认为，为了维护君主专制集权，不但需要“法”，而且需要“术”。所谓术，就是君主暗藏在心中、用来控制驾御群臣的权术和手段。有了这种术，国君就可以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独揽政权。另外，他还认为“抱法处势”才能令行禁止。所谓势，就是君主在臣下心中形成的威势、威力、威望，它是君主控制臣民所凭借的力量，是实行法治的前提和保证。可见，韩非的政治主张完全是为当时地主阶级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服务的。这顺应了当时的历史潮流，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他主张使用暴力镇压一切反抗者，这种暴力统治，后来被取得政权的统治者用来对付人民。可见，批判韩非的一整套君主专制主义的政治策略，有助于我们彻底摆脱专制独裁的束缚，使人们的思想从封建主义的桎梏中

解放出来。

当然，在韩非的思想中，也保存着很多科学性的精华。比如他善于用历史进化论的观点来观察社会，主张因时制宜地变革社会，以适应时代的要求。韩非的辩证法思想、唯物主义自然观和认识论，也是值得我们批判地继承的。

韩非的思想主要保存在他的著作《韩非子》一书中，因此，要了解我国整个封建社会及其思想残余，要了解我国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源流，就要读《韩非子》。

《韩非子》一书的价值还表现在文学方面。《韩非子》的政论文，锋芒毕露，语气专断，表现出一种严峻、尖刻的文风。韩非的文章观点鲜明，严肃劲拔，显示出一种斩钉截铁的力量，大都褒贬分明，透澈明白，析理周详，气势逼人。他的有些长篇论文，结构严谨，构思巧妙，论据周密，不可辩驳，确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珍品。他的语言犀利，深刻入微，显示出他的文章的峭拔、严肃的风格。因此韩非的文章至今仍是我们作文的典范。

韩非的文章还善于运用历史故事和寓言进行说理，因而书中汇集了许多有名的寓言、故事。陈蒲清先生在他的《中国古代寓言史》中，称这些故事为寓言群，他在《〈韩非子〉寓言故事总目》中一共列出 323 则寓言，还说：“古希腊寓言的总集，皆寄托在伊索名下，仅数百则。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莱比锡出版的托伊布纳希腊罗马作家丛书《伊索寓言汇编》，只收了寓言三百零七则；这个数字，仅仅相当于《韩非子》一书中的寓言数。”可见《韩非子》的寓言体制是相当宏伟的。这些故事至今在人民中流传，有的已凝固成为成语，如“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老马识途”、“滥竽充数”等等。当阅读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不禁被其浓厚的文学色彩所吸引。阅读这些故事，不仅能使我们了解历史，丰富语言，而且能增长才华，启迪智慧，提高我们的思辨能力。

总之，《韩非子》一书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它是学习和研究中

国古代的政治、文化、经济、历史不可缺少的宝贵资料。但是,它毕竟是一本古书,系几千年以前的作者写成,由于时代和语言的变迁,故一般人难于读懂。为了弘扬祖国的传统文化,我应岳麓书社之邀,译出这本《白话韩非子》,所依照的底本是岳麓书社出版的《古典名著普及文库》中张觉点校的《商君书·韩非子》,读者可将两书对照阅读。但有个别地方,也依据了不同的版本。译文的指导思想是尽量忠实于原作,逐词对译,以便读者与原文对照。这样做,势必影响到译文语句的通畅,但我们认为这样可使原意不走样,有利于初学者学习。也就是说,在信、达、雅三方面,我们先注重信,然后考虑达与雅。全书完成后,自己感到不甚满意,但限于能力,只好以此交稿付印。错误不当之处,尚希大家指正。

李传书

1991年12月于长沙

白话商君书目录

第一卷

一、更	法	(3)
二、垦	令	(5)
三、农	战	(9)
四、去	强	(14)

第二卷

五、说	民	(19)
六、算	地	(23)
七、开	塞	(28)

第三卷

八、壹	言	(32)
九、错	法	(34)
十、战	法	(36)
十一、立	本	(38)
十二、兵	守	(39)
十三、靳	令	(40)
十四、修	权	(43)

第四卷

十五、徠	民	(46)
十六、刑	约(亡佚)	(49)
十七、赏	刑	(49)
十八、画	策	(53)

第五卷

十九、境	内	(58)
二十、弱	民	(61)

二十一、御	盜(亡佚).....	(64)
二十二、外	内.....	(64)
二十三、君	臣.....	(66)
二十四、禁	使.....	(68)
二十五、慎	法.....	(70)
二十六、定	分.....	(72)

佚 文

六 法	(76)
-----------	------

第一卷

一、更 法

更法即改变法度。

秦孝公研究治国的策略，公孙鞅、甘龙、杜挚三位大夫侍候在孝公跟前。他们考虑社会情况的变化，探讨整顿法制的根本，寻求役使民众的方法。

秦孝公说：“替代先君立为国君后不忘记国家政权，是当君主的道德准则；实行法治而努力彰明君主的权威，是做臣子的行为准则。现在我想改变法度来治理国家，变更礼制来教导百姓，但是又怕天下的人要议论我啊。”

公孙鞅说：“我听说过这样的话：‘犹豫不决的行动不会有什么名堂，迟疑不决的行事不会有什么功效。’国君赶快拿定变法的主意，还是不要去顾忌天下人议论您啊。况且具有出众行为的圣人，本来就要被世俗社会所非议；具有独特见识的谋士，必然会被民众所嘲笑。俗话说：‘愚昧的人对于既成的事实都还不明白，聪明的人对于还没有露出苗头的事情就已经观察到了。民众，不可以和他们谋划事业的开端，只可以和他们欢庆事业的成功。’郭偃的法书说：‘讲究最高道德的人不去和世俗附和，成就丰功伟绩的人不去和群众商量。’法度是用来爱护人民的，礼制是用来方便办事的。因此圣人治国，如果可以用来使国家强盛，就不去效法那旧的法度；如果可以用来使人民得到好处，就不去遵循那旧的礼制。”

孝公说：“好！”

甘龙说：“不对。我听说过这样的话：‘圣人不去改变民众的礼

俗来施行教化，智者不去改变原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顺着民众的礼俗来施行教化，不费辛劳而功业就能建成；根据原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官吏既熟悉而民众又安宁。现在如果要改变法度，不遵循秦国的旧法，要改变旧的礼制来教化人民，我怕天下的人会议论国君，希望国君仔细考察一下这种情况。”

公孙鞅说：“您所说的，是社会上俗人的言论。平庸的人安守旧的习惯，学究们拘泥于他们的见闻。这两种人，只能用来安置在官位上维护法制，而不能和他们讨论变革法制的事。夏、商、周三代的礼制不同，但都能称王天下；春秋五霸的法度不同，也都能称霸诸侯。所以有智慧的人创制法度，而愚昧的人只能受法度的制约；有德才的人改变礼制，而没有德才的人只能受礼制的束缚。受礼制束缚的人，不值得和他们商议政事；受法度制约的人，不值得和他们谈论变法。国君不要疑惑不定了。”

杜摯说：“我听说过这样的话：‘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改变法度；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更换工具。’我听说过：‘效法古代的法制不会有过错，遵循古代的礼制不会有偏差。’国君还是应该好好考虑一下这件事啊！”

公孙鞅说：“过去的朝代政教不同，该效法哪一代的古法？过去的帝王不相因袭，该遵循谁的礼制？伏羲、神农，施行教化而不加诛杀。黄帝、尧、舜，施行诛杀而不过分。等到到了周文王、周武王的时候，他们各自顺应时势而建立法度，根据社会情况而制定礼制。礼制、法度要根据时势来确定；制度、命令要各自顺应它们的相关事宜；兵器、铠甲、器具、设备，都要有利于它们的使用。我所以说：治理社会不必采取同一种方法，为国家谋利益不必效法古代。商汤、周武王的称王，正是由于他们不遵循古法而兴盛的；商朝、夏朝的覆灭，正是因为商纣王、夏桀不变换礼制才灭亡的。这样看来，那么违反古代法度的人不一定就可以否定，而遵循古代礼制的人也不值得赞扬肯定。国君不要再疑惑不定了。”

孝公说：“好！我听说，偏僻里巷中的人们往往少见多怪，一知半解的学者常常发生争辩。愚昧的人所高兴的事，聪明的人为它悲哀；狂妄之徒所欢乐的事，贤能的人为它忧伤。甘龙、杜挚等拘泥于世俗偏见来议论，我不再因为他们的说法而疑惑不定了。”于是就发布了开垦荒地的命令。

二、垦 令

垦令即垦荒的法令。

不准官吏有隔夜的政务，那么即使是邪恶的官吏也来不及到民众那去谋取私利了。而群臣百官的公务不互相拖拉，那么农民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去从事农业生产；邪恶的官吏来不及到民众那里去谋取私利，那么农民就不会受到损害。农民不受到损害而又有更多的时间去从事农业生产，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根据粮食产量来征收土地税，那么君主的地税制度就能统一，而农民的负担就公平了。君主的地税制度统一，就有了信用；有了信用，那么臣下就不敢搞歪门邪道。农民的负担公平，就会慎重地看待自己的职业；慎重地看待自己的职业，就不会轻易改行。君主有了信用而官吏不敢搞歪门邪道，农民慎重地看待自己的职业而不轻易地去改变它，那么民众就不会认为君主不对，而心中也不会怨恨官吏。民众不认为君主不对，心中也不怨恨官吏，那么壮年人就会积极务农而不再改行。壮年人积极务农而不改行，那么年轻人就会学习他们而不断地从事农业劳动。年轻人学习他们而不断地从事农业劳动，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不要因为外国的势力而给人封爵位、授官职，那么民众就不会看重学问，也不会轻视农业。民众不看重学问，就会愚昧无知；愚昧

无知，就不会和外国交往；民众不和外国交往，那么国家就安全而没有危险。民众不轻视农业，就会努力务农而不偷懒。国家安全而没有危险，民众努力务农而不偷懒，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达官贵族的俸禄高而收税多，吃闲饭的人口众多，这是败坏农业的事。所以要按照他们吃闲饭的人口的数目征收赋税，并加重他们的徭役。这样，达官贵族就不会多收食客，因而那些邪恶不正、整日游荡、到处游说、好吃懒做的人就没有什么地方能混饭吃。这些人没有什么地方能混饭吃，就必然会去务农；这些人都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使商人不得卖粮，使农民不得买粮。农民不得买粮，那么懒惰的农民就会勤奋耕作。商人不得卖粮，那么在丰收年景就不能靠卖粮食而更加享乐，在荒年也没有厚利可得，丰收年景不能更加享乐，荒年没有厚利可得。那么商人就害怕了；商人害怕经商，就想去务农。懒惰的农民勤奋耕作，商人想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靡靡之音、奇装异服不准流行到各县去，那么农民出外劳动时就看不到奇装异服，在家休息时就听不到靡靡之音。在家休息时听不到靡靡之音，那么精神就不会涣散；出外劳动时看不到奇装异服，那么心意必然会专一。农民心意专一而精神不涣散，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不准雇请佣工，那么大夫家长就不能建造修缮房屋，他们溺爱的子女和懒汉就不能再偷懒，而佣工也就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混饭吃，这样的话，他们就一定会去务农。大夫家长不建造修缮房屋，那么农业生产就不会受到妨害。大夫溺爱的子女和懒汉不再偷懒，那么原有的田地就不会荒芜。农业生产不受到妨害，佣工更加努力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废除旅馆，那么奸邪诡诈、不安心本职、私下勾结、迷惑农民的人就不能外出旅行，而开设旅馆的人也就无法谋生了，那么他们就

一定会去务农。这些人都去务农，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由国家统一管理山林湖泊的资源，那么厌恶农耕、懈怠懒惰、加倍贪婪的人就没有地方混饭吃了。这些人没有地方混饭吃，就一定会去务农。这些人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提高酒、肉的价格，加重对酒、肉的税收，使税额是它成本的十倍，这样的话，那么卖酒、肉的商人就会减少，农民也就不可能再嗜酒畅饮，大臣也就不会再荒废政事而大吃大喝。商人减少了，那么国家就不会浪费粮食。农民不能嗜酒畅饮，那么从事农业生产也就不会懈怠。大臣不荒废政事，那么国家的政务就不会拖延积压，国君就不会有错误的措施。国家不浪费粮食，农民不放松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加重刑罚，并使联保组织中的人连同罪人一起受到惩处，那么心胸狭隘、性情急躁的人就不敢再斗殴打架，凶暴蛮横、强悍刚烈的人就不敢再争吵辩嘴，懈怠懒惰的人就不敢再游手好闲，挥霍钱财的人就不会出现，用花言巧语来阿谀奉承而存心不良的人就不敢再耍花招了。这五种人不存在于国内，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使民众不得擅自搬迁，那么一些愚昧无知而蛊惑农民的人就无法施展其伎俩，没有什么地方再能混饭吃，而必定会去务农。愚昧无知、见异思迁的人都能一心一意地务农，那么农民就一定会安居乐业。农民安居乐业而愚昧无知，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同样地制订颁布有关嫡长子以外的儿子负担徭役的法令，按照名册使他们服役，并且提高他们免除徭役的条件，让他们从掌管称量粮食的官吏那里取得口粮，但取得口粮时必须合乎一定的标准。由于不可能逃避徭役，而大官又不一定能当得上，所以这些贵族子弟就不可能周游四方去侍奉豪门权贵，而一定会去务农。这些人都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国家的大臣和大夫们，对于博学多闻、能言善辩、施展智巧、外

出周游而寄居他乡的事情，都不准许做，尤其不准到各县去居住活动，那么农民就没有什么地方能听到奇谈怪论、见到儒家学说。农民没有什么地方能听到奇谈怪论、见到儒家学说，那么聪明的农民就没有门径脱离他们原来所从事的农业，而愚蠢的农民也就更加愚昧无知，不会爱好学问。愚蠢的农民愚昧无知，不爱好学问，那就会致力于勤奋耕作。愚蠢的农民致力于勤奋耕作，聪明的农民不脱离他们原来所从事的农业，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命令在军队内部的集市上不准有女子；又命令其中的商人，让他们每人都给自己所在的部队供应好铠甲兵器，使他们时刻注意军队的战斗动员情况；又使军队内部的集市上不准有私下运输粮食的人。这样的话，运用私通的谋划就无法搞到隐藏的场所，偷粮食的人就没有地方出售，运粮的人就不能私下贮藏，轻浮懒惰的人就不会到军队内部的集市上去活动。偷粮食的人没有地方出售，运粮的人不能私下贮藏，轻浮懒惰的人不到军队内部的市场上去活动，那么农民就不会到处游荡，国家的粮食也就不会破费，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各县的政治措施必须一个样子，那么调职升迁的官吏就不能美化自己，接替的官吏就不敢改变国家所统一的制度，由于犯了错误而被罢免的官吏也就不能隐瞒他的错误行为。官吏的错误行为不能隐瞒，那么当官的就没有邪恶的人了。升迁的官吏不能美化自己，接替的官吏不敢改变制度，那么从属官员就可以减少，而农民就不会有过重的负担。官吏没有邪恶的行为，那么农民就不会四出奔走，逃避他们；农民不四出奔走，那么农业就不会遭到破坏。从属官员减少了，那么征收的赋税就不会多。农民没有过重的负担，那么务农的时间就多了。务农的时间多了，征收的赋税不多，农业不遭到破坏，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加重关口、集市上的商品税，那么农民就不愿意经商，商人就会有怀疑松劲的思想。农民不愿意经商，商人顾虑重重而懒得经

商，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按照商人家中的人数来向商人摊派徭役，使他们家中劈柴的、赶车的、服役的、当僮仆的各种家丁，必须到官府登记注册，并按照名册服役，那么农民就安闲，而商人就劳苦。农民安逸，那么良田就不会荒芜；商人劳苦，那么往来赠送的礼物，就不会运到各县。这样的话，农民就不会挨饿，办事也不会再搞什么送礼之类的礼仪客套。农民不忍饥挨饿，办事又不搞什么礼仪客套，那么他们对于公家的工作就一定会积极去干，而私人的事情也不会荒废，这样，农业方面的事情就一定能搞好。农业方面的事情一定能搞好，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规定运送粮食时不得采取雇用别人车子的办法，运送粮食的车子不准在返回途中受雇给人家，车子、拉车的牛、所载粮食的重量在实际服役时必须和注册时的登记相当。这样的话，送粮的车子就去得迅速来得也快，送粮的工作就不会妨害农业生产。送粮的工作不妨害农业生产，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不准为罪人向官吏请托说情，送饭给他们吃，那么邪恶的人就没有了主子。邪恶的人没有主子，那么为非作歹就得不到鼓励。为非作歹得不到鼓励，是因为邪恶的人没有了依靠。邪恶的人没有依靠，那么农民就不会受到损害。农民不受到损害，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够开垦了。

三、农 战

农战即农耕与作战。

大凡君主用来勉励民众的，是官职和爵位；国家赖以兴盛的，是农耕和作战。现在民众取得官职爵位，都不是靠了农耕和作战，

而是靠了巧妙的谈说和空洞的说教，这就只能叫做勉励民众，而不能称为兴国。只会勉励民众的君主，他的国家必然没有实力；没有实力的君主，他的国家必然会削弱。

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他教育民众都专心从事农战来取得官职和爵位，所以不专心从事农战，就不能做官、没有爵位（此当作“是故不作壹，不官无爵”）。国家清除空谈，那么民众就朴实；民众朴实，就不会放荡。民众看到君主的爵禄奖赏只从从事农战这一个口子发放出来，那就会专心从事农战了；民众专心从事农战，那就不会苟且经营其他的行业了；民众不苟且经营其他的行业，那么国家就实力雄厚；实力雄厚，那么国家就强大。现在国境内的民众都说：“农耕和作战可以逃避，而官职和爵位照样可以得到。”所以那些才干出众的人都愿意改行，而致力于学习《诗》、《书》，追随外国的势力，这样弄得好的可以得到显赫的地位，差一点的也可以得到一官半职；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就去经商，搞手工业，都靠这些行当来逃避农耕和作战。上述这两种情况都具备，国家就危险了。对于民人，君主用上述这两种人的行为作为教育的内容，他的国家就必然会削弱。

善于治理国家的人，粮仓虽然满满的，对农业也不放松；虽然国家大、人口多，对空谈也不放任；这样，民众就朴实而一心一意地行善了。民众朴实而一心一意地行善，是因为官职和爵位不能用巧诈的空谈来取得。官职、爵位不能用巧诈的空谈来取得，那么奸诈的人就不会产生。奸诈的人不产生，那么君主就不会被迷惑了。现在国内的民众以及据有官职、爵位的人，看见朝廷上可以用巧诈的空谈、动听的游说来取得官爵，所以官爵就不可能再按照国家的法规来取得。因此他们上朝就曲意逢迎君主，退朝回家就图谋私利、考虑饱其私囊的办法，这样的话，他们就在下面卖弄权势了。曲意逢迎君主而图谋私利，是不利于国家的，但他们要这样做，是为了那爵位俸禄；在下面卖弄权势，就不是忠臣，然而他们要这样做，是